

刘国光经济文选

(1991—1992)

经济管理出版社

刘国光经济文选

(1991—1992)

经济管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9 号

责任编辑:肖 红

技术设计:桑崇基

刘国光经济文选

(1991—1992)

出版:经济 管 理 出 版 社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红园胡同 8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总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冶金出版社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0 印张 260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80025-808-4/F·665

定价: 12.00 元

刘国光经济文选

(1991—1992)

经济管理出版社

目 录

展望 90 年代的中国经济	1
《不宽松的现实和宽松的实现》一书的“绪论”	5
要大力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48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1 年 9 月召开的 巴黎“持续发展国际讨论会”上的发言	53
关于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	58
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与对外开放	90
《我的经济观》 ——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	96
谈谈我国所有制关系的改革	134
继续推进证券市场的完善和发展	142
关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的几个问题	146
对 90 年代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再思考	154
中国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	166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	183
十四大是一座里程碑	200
略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03
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211
改革是第二次革命	218
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与前瞻	221
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227
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236
对三峡工程是否上马之我见	

深化理论分析,促进三峡工程早日上马

——关于三峡工程的若干意见…………… 244

谈谈兴建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和经济合理性…………… 249

兴建三峡工程是我国国力能够承受的…………… 254

答记者问

谈谈逐步加大改革的份量…………… 258

90年代深化改革的理论思考…………… 263

1991: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充满机遇…………… 271

集中力量调整产业结构…………… 280

今年(1991年):“八五”头一年起步良好

明年(1992年):结束治理推进配套改革…………… 285

1992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黄金时期…………… 290

加快改革 促进发展…………… 297

经济改革的形势及其难点、热点…………… 302

谈提高产品质量问题…………… 310

展望 90 年代的中国经济

(一)我们现在正在从 80 年代进入 90 年代。90 年代将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非常关键的时期。这是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决定的。从国际看,旧的国际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或正在形成,国际政治、经济斗争和综合国力的竞赛非常激烈,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很严峻,但是在风云变幻多端的国际环境中,我们中国仍然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在国际形势一片混乱中处于一种比较主动的地位,有可能在最后十年或更长时期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从国内看,我们在 80 年代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社会生产、综合国力、人民生活、科教文建设、体制改革等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这为 90 年代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我们曾经受住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严峻考验。但是在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益上,在人口压力、资源限制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制约着我们今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总之,90 年代我们既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又有着许多好的机遇,我们能不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巩固和发展 80 年代已经取得的成就,大力推进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这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 本文是作者 1991 年 1 月 9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新华社联合举办的《中国与世界:90 年代中国经济展望》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原载《学习与研究》1991 年第 2 期。

(二)今后十年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的重要任务,是要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人民生活从温饱过渡到小康水平,并把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90 年代经济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主要不在数量和速度,而在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经济效益与质量的提高,而我们知道,目前,障碍着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益提高的深层症结,主要在于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中存在的种种缺陷,这些缺陷的克服,关键在于把经济改革进行到底。所以,为了完成 90 年代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并且为下一个世纪向第三个战略目标前进作好准备,今后十年特别是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工作,我以为必需十分突出深化改革的问题。我国关于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设,提出了这十年要初步建立适应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明确规定了改革的基本方向,主要任务和措施,这将大大推进 90 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

(三)在跨入 90 年代门槛的时候,中国的经济面临着三项任务:治理整顿、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我们是在继续治理整顿期间研究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因此要正确处理好治理整顿、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三者的关系。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和七中全会确定的治理整顿的方针,经过两年多的贯彻执行,已经在总量控制等方面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但是,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整顿的六项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差,经济体制关系不顺等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治理整顿任务仍然艰巨,必须继续抓紧进行。但是,六项目标不可能全部在治理整顿期内完成,有些要在更长期的发展与改革中来完成。“八五”头一年或者稍长一点时间,要以治理整顿为主,继续巩固抑制通货膨胀,促进农业丰收和工业回升,以及对外贸易改善等方面的成果,把治理整顿的重点从总量控制为主转为结构调配等深层次的问题上来。在继续治理整顿中深化改革,求得发展。在治理整顿

基本完成以后,要转入发展与改革为主,同时还要完成治理整顿中遗留下来的任务,其中如结构的改善和效益的提高,本身就是发展任务题中应有之义,也必须依靠深化改革来完成。至于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的关系,我觉得过去在“七五计划建议”中关于这个问题有一段话讲的比较好,今天还有现实意义,值得重提一下,大意是说,经济改革与经济建设(即发展)要互相适应,互相促进,从根本上说,改革是为建设(即发展)服务的,从当前上说,建设(即发展)的安排要有利于改革的进行。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合理确定经济增长率,防止盲目攀比和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速度,避免经济生活的紧张和紊乱,为改革创造一个很好的经济环境。这里讲的为改革所需要的良好的经济环境,也就是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要基本平衡,或供给略大于需求,保证必要的后备和机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相对宽松的环境,以利于改革的进行。当前,经过两年多的治理整顿,大体上已出现这样的有利于推进改革的相对宽松的环境,所谓的“市场疲软”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这样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今后十年如果我们能够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而不去追求过于紧张的速度,我们也就能够继续保持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我们应当抓紧这样的有利时机,加快改革的步伐,为90年代以及下一世纪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高效的发展奠定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基础条件。

(四)90年代中国经济将要发生的变化是80年代中国经济大变化的继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意义不亚于1949年后的变化。这个变化从理论上说可以概括为互相连系的双重转换,一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换,一是经济体制的转换。发展战略的转换就是从原来的速度型、数量型、外延型、粗放型的发展战略转变为效益型、质量型、内涵型、集约型的发展战略。经济体制的转换就是从原来的产品经济、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排斥市场机制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这两重转换在80年代开了一个头,

在十年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曲曲折折,整个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90年代还要继续深入进行下去。这在“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建议中得到了反映,“建议”把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放到比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地位,把结构调整、加强农业、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改组改造加工工业、加强科技教育事业作为今后十年的“八五”时期的建设重点。把技术改造放到比新建扩建更重要的地位,以及把节约能源材料放在比对于能源、原材料部门实行投资倾斜更为重要的地位,等等。这都体现了向内涵型、效益型发展战略的进一步转换。而在经济体制转换方面,则明确提出了今后十年要初步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并且在企业改革、市场改革、物价改革、以及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等等方面,沿着有计划指导、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规定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任务和措施。比如我们重新肯定了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市场调节的范围,再次肯定了企业的改革要以政企分开为方向,价格的改革要逐步缩小国家定价的范围,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宏观管理要从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等等,这些都是为有计划指导、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取向改革规定的一系列深化改革措施。以上所述的所有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重点任务的完成,将把我国经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端的大变动中进行的双重模式转换大大推向前进,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加完善、健全,使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加蓬勃、兴旺,这样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能够得到更充分发挥,具有更大吸引力,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更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不宽松的现实和宽松的实现》 一书的“绪论”

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事业中，走过了四十年的光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近十年多的改革，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又掀开了新的一页。但是，无论前三十年或近十年，在积聚丰富经验的过程中，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历尽了曲折和艰辛。正象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有失误。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往往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因此，必须牢固地树立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本来已经提出多年，“但是并没有真正为全党同志共同接受和认真贯彻执行”。现在作为党的决定，则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工作在认识上和实践上的突破性进展。具体地研究这个问题，成为我国经济界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紧迫任务。这本论著，就是在几年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基础上，着眼于 90 年代，进一步总结、思考和探索的结果。本文的内容是对全书的综述，概括地表明我们的基本思路，特别是突出某些多少含有新意的看法和想法，希望得到

• 刘国光、戴园晨等著《双重体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8 月出版。本文与沈立人合作写。

关注此一问题的同志的指正。

情势的重述和探索的回顾

我们四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十多年来的成就,国内外的文献都有翔实的纪录和生动的描述,这些毋需再作系统的论证。对于 80 年代的进展,不妨归纳为这样三个方面:

一是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建设。80 年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77 万亿元,超过前 30 年的总和。其中,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 1.08 万亿元,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有 1000 多个;投入更新改造资金 5470 亿元,完成技术改造项目 40.9 万项。与 1949 年相比,煤、电、钢铁、纺织等工业的生产能力增长以十几倍、几十倍计。同时,还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如汽车、飞机、电子和石油化工等,初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在农业上,兴修水利,整治耕地,发展了农业机械化和乡镇企业,实现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铁路、公路、水运、空运能力和邮电通讯等设施能力也有了迅速的增长。

二是在大规模建设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从国民经济恢复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1953 年算起,到 1990 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社会总产值为 8.7%,农业总产值为 3.6%,工业总产值为 11.7%;1990 年同 1980 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 2.3 倍,平均每年增长 12.6%,农业总产值增长 84.6%,平均每年增长 6.3%。粮食、棉花和原煤、原油、电力、钢铁、机床、水泥以及纱、布和某些家用电器的产量都有不同倍数的大幅度增长,不少产品产量先后跃居世界各国同类产品产量的前列。

三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城乡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尤其是近十年,人民得到的实惠较多。1990 年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达到 1387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630 元,剔除物价因素,分别比 1980 年增长 68.1% 和 123.9%。全国绝大多数居

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过渡。

重述这些人们熟悉的数字,肯定了我四十年来的经济情势是不断向上的,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的真理。我们不仅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是如此,并且进行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但是,在总结经验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忽视前进中的问题。总体上看,建国以来的四十年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三十年(1949—1978年),经济是发展的,而动荡比较激烈;后十年(1979—1988年),经济发展比较顺利,但也不是没有起伏。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学界提出周期性波动的问题,说法不尽一样。一般认为,这种波动周期是五年左右一次,先后出现过八次:第一次是1953—1957年,第二次是1958—1962年,周期各为5年;第三次是1963—1968年,周期为6年;第四次是1969—1972年,第五次是1973—1976年,周期各为4年;第六次是1977—1981年,第七次是1982—1986年,周期各为5年,第八次是1986年以后,周期也在五六年之间,可能到1991年后渐趋正常。

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有人认为是难免的,不同经济制度的各国都无例外。但是,我们必须加以区别。一种波动确实难免,有如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影响农业生产,由于重大工程的兴建和投产而影响增长速度,由于科学技术的突破而加快发展步伐,由于国际市场的旺衰而导致产销畅滞等。历史资料表明,这种波动幅度有限。另一种波动,其幅度比上述大得多,也不是由于上述原因所产生,则不能认为是必然的。我国经济发展的波动,其幅度比别国大得多。据计算,1953—1985年我国的波动系数(每年的增长速度和平均增长速度的差距)超过22个百分点,比美国高4.7倍,比日本高2.7倍,比联邦德国高3.4倍,比法国和英国高5.1倍,比苏

联高4倍。其中,1958—1962年达66.5个百分点。^①并且周而复始,始终未得到有效纠正。这就值得认真研究了。

这样的经济波动,也不象有人所说,有利于高速增长,或者是高速增长的客观规律即所谓“不平衡——平衡——不平衡”或“高速度——低速度——高速度”的规律。相反,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和至今存在的若干主要问题或消极面,都与这种增长的大起大落有直接、间接的关系。

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首先,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速度和效益本来是统一的,但在经济增长不稳定的情况下,两者之间就有矛盾。它表现在:当追求高速增长时,往往只图产出,不计投入,以牺牲效益为代价;当速度被迫下降时,往往效益率先“滑坡”。几次三番的大起大落,使资源利用效率也随之起伏,甚至越来越低。例如我国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1952年为71元,“一五”时期平均为32元,“二五”时期平均只1元,“三五”、“四五”、“五五”时期分别为26元、16元和24元,“六五”时期为41元。另如以产值、资金、成本、工资为基数的各种利润率和投资产出率,几乎都未恢复到历史上的最好水平。

其次,不利于优化产业结构。稳定增长和比例协调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不仅使总量失衡,并且使结构失调。无论是过去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或近年来的“轻工业六个优先”,都使产业结构过度倾斜,进而成为制约稳定增长的障碍。我国第一、二、三次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78年为29%、48%和23%,1987年为29%、46%和25%,变化甚微;而在工、农业之间及其内部,尤其是基础产业和加工行业,相互脱节越来越明显;至于企业组织结构和区域布局等,同样存在无序现象。

再次,不利于实现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应当以科技进步为动

^① 参见程秀生等:《对我国经济中长期稳定增长的初步研究》,《经济研究》1990年第2期。

力。但在一味求快的扩张冲动下,容易侧重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以基本建设排斥和替代更新改造,甚至蓄衍增长较快的低技术,使整个技术结构难以逐步升级。同时,在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统治下,使产品不愁销路,也无助于推动新产品的开发和产品质量的提高。

最后,不利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相反,却会欲速不达或得而复失。每个波动周期都有其高峰和低谷。在高峰期,曾经出现过年增长率达到15%甚至超过20%的“奇迹”,令人兴奋不已;但是无法持久,随即“滑坡”,有时竟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两者相抵,平均增长率一般仅为高峰期的一半或更低,与原来的期望值相差很大。在一起一伏之间,损失严重,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改善程度与名义上的经济增长率不相称。

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除了非经济因素外,根本的问题是:

一方面,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迟迟未得及时的转换。我们在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时,限于当时的种种条件,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只能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沿袭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特征,是以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为主要目标,以增加投入即提高积累率为主要手段,以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这在工业化初期,本来无可厚非,而且确实取得了积极效应。但是同时,逐步暴露了某些矛盾,例如追求速度而不顾效益,偏好工业而忽视农业,过多积累而抑制消费,等等。不少发展中国家已经先后转向采取所谓变通的或新的发展战略。我们不是没有觉察,但是对其惯性估计不足,特别是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总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是高速度(而不是高效率),制定经济发展计划以产值为中心。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惯性进一步凝成了以产值增长速度高低作为评价标准的业绩机制并诱发攀比机制,更是积重难返。经久不衰的“产值热”,成为导致周期性大起大落不可抗拒的盲动力量。

另一方面,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也迟迟未得及时的转换。一定

的经济管理体制服从于和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也由于缺乏经验,我们起初只能大体上仿效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套,沿袭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特征就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这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对于集中力量发展重点部门,同样是有有效的。但是,在经济发展到相当水平后,其弊端则不断暴露,特别是变为两个“大锅饭”,导致“投资饥饿症”和“消费饥饿症”,从部门、地方到企业都热衷于扩张冲动,缺乏自我约束的机制。需要指出的是:经过近几年的初步改革,“投资饥饿症”没有治愈,“消费饥饿症”却从隐性转为显性。这种双重膨胀,来自改革处于双重体制并存阶段的某种错位即微观有所放活而宏观则更失控。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粘性与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的惯性相结合,造成长期以来的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在总量上的失衡和结构上的失调,突出地表现为“短缺”。经济环境经常是紧张的,无论在大起阶段或大落阶段,除非化很大力气,才有短暂的、稍纵即逝的宽松。

这些经济现象及其剖析和溯源,大家并不是没有认识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效果和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陈云也说过:“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①“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

^① 《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页。

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① 根据这些精神,我们多年来探索过此一问题,现在略作回顾如下:

最初,在进入 80 年代,我国经济学界开始提出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新的用语并着手研究这个新的课题时,我们认为:“中国过去的发展战略几经变化,有比较正确的时候,也有重大失误的时候。当战略决策正确时,国民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得以改善,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巩固;而当战略决策失误时,经济发展就受挫折,人民生活不能改善,社会主义制度也会受到削弱。”^② 回顾过去,我们肯定:“建国 30 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如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有了相当的重工业基础,基本上解决了 10 亿人民的温饱问题等等”;同时,并不否认发生过一些挫折和偏差,“这种偏差,主要是经济建设上要求过急,……表现为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和投资规模,超出了国力的可能,结果不得不收缩,一进一退,损失很大,浪费了时间。”^③ 总结经验教训,对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提出以下几点:(1)“在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上,从过去常常片面追求多高速增长转变为更加注意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2)“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的问题上,从过去的片面追求高速度转变为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中心任务”;(3)“在处理平衡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的关系上,从过去的片面突出重点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转变为抓重点、促平衡的发展战略”;(4)“在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上,从过去的一味依靠上新的建设项目的外延发展方式转变为更多地注意通过企业的整顿、改组和技术改造来挖掘现有企业潜力的内含发展方式”;(5)“在物力和人力两种资源的开发上,从过去的只

① 《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陈云文选(1956—1985 年)》,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80 页。

② 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 页。

③ 同上书,第 21~22 页。